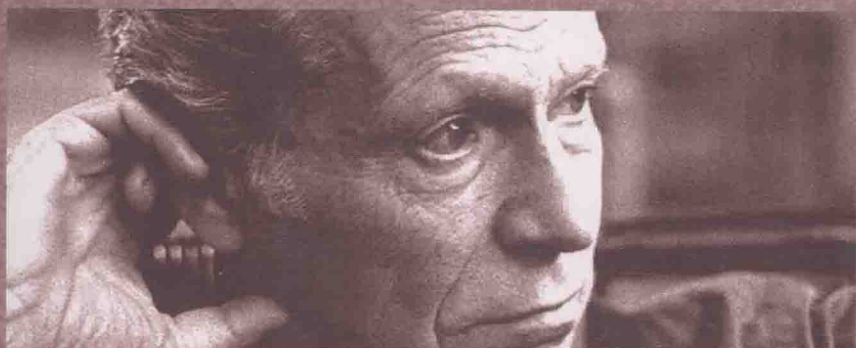


[美] 杰里米·阿德尔曼 (Jeremy Adelman) / 著 贾拥民 / 译

WORLDLY PHILOSOPHER

The Odyssey of Albert O. Hirschman



入世哲学家

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 CITIC PRESS



WORLDLY PHILOSOPHER

The Odyssey of
Albert O. Hirschman

入世哲学家

阿尔伯特·赫希曼的
奥德赛之旅

[美] 杰里米·阿德尔曼 (Jeremy Adelman) / 著

贾拥民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 /
(美)阿德尔曼著；贾拥民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6.10

书名原文：Worldly Philosopher: The Odyssey of
Albert O. Hirschman
ISBN 978-7-5086-6250-3

I. ①入… II. ①阿… ②贾… III. ①赫希曼, A. (1915 ~ 2012) — 传记 IV. ① K837.12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3279 号

Worldly Philosopher: The Odyssey of Albert O. Hirschman by Jeremy Adelman
Copyright © 2013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China CITIC Press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

著 者：[美]杰里米·阿德尔曼 (Jeremy Adelman)
译 者：贾拥民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 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61 字 数：787 千字
版 次：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ISBN 978-7-5086-6250-3
定 价：1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849555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序一 现世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的思想之旅

1996年，在为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扛鼎之作《激情与利益》^①一书所作的序言中，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教授的开篇第一句就说：“阿尔伯特·赫希曼是当代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他的著作改变了我们对经济发展、社会制度和人类行为的认识，也改变我们对身份认同、忠诚、义务的性质和意义的理解。”（Hirschman, 1977/1997, p. ix）森教授的这句话，言简意赅，大致总结了当代世界的一位思想大师阿尔伯特·赫希曼主要学术贡献和在当代人类社会思想史上的地位。这本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杰里米·阿德尔曼（Jeremy Adelman）教授花十余年研究功夫、亲身访谈和查询档案资料所撰写的《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全面、细致而翔实地介绍了赫希曼这位当代全球化知识分子一生的生活经历、思想历程和学术贡献。而贾拥民先生翻译的这本800余页的思想传记巨著，也向广大中文读者提供了一个可靠和可信的中译本。

在有文字记载的人类社会文明史上，20世纪可谓是一个跌宕起伏、复杂多变和波澜壮阔的世纪。在20世纪，世界上曾发生了上亿人丧亡的两次世界大战，出现过德国希特勒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权，发生了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并且也在十几个国家发生了70余年中央计划经济的实验，并在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了苏联的解体，东欧的

① 赫希曼的这本《激情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论争》，英文书名为：“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目前这本书在中国大陆已经有两个中译本：一个是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李新华和朱进东的译本；一个是2015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冯克利教授的译本。两个中译本都把这本书翻译成了“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论争”。2006年我在哈佛大学访学时就读了这本书的中译本。通过反复琢磨这本书的论述，我比较倾向于浙江大学罗卫东教授和本书译者贾拥民的见解，觉得把“Passion”翻译为“激情”为好。另外，由于这本书的书名包含着“political arguments”，而不是“political debates”，我觉得这本书的书名最好还是被较为精确地翻译为“激情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论争”，而不是“激情与利益：资本主义胜利之前的政治论争”。

转制，中国和越南的市场化改革。在跌宕起伏的 20 世纪里，西方国家实际上也经历了一个现代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制度的巨大变迁和演进过程。伴随着 20 世纪人类社会跌宕起伏的制度演进和变迁，也有无数的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从多学科的角度在探索、反思和理论化地揭示人类社会运行的一般原理和与基本法则。这其中包括马克斯·韦伯、约瑟夫·熊彼特、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约翰·罗尔斯、罗伯特·诺齐克、詹姆斯·布坎南、阿马蒂亚·森等等。本传记的主角赫希曼，无疑也是这些当代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不过与其他跨学科的伟大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不同，赫希曼一生的坎坷而又辉煌的学术探讨和著述经历有以下几个特点：（1）赫希曼更多地是从身临其境的现实观察而不是从宏大的理论推理和逻辑叙事来论述人类社会运行和演变的一些基本原理；（2）与其他一些思想家更多地在西方大学中教书和做研究相比，赫希曼一生坎坷和从事过多种职业，更多地是参与到现实社会实践而进行观察和思考，因而被这位传记的作者称为“worldly philosopher”（这个词组在中文语境中可被理解为“俗世的哲学家”“入世的哲学家”和“现实世界的哲学家”）；（3）赫希曼早年背井离乡、历经磨难、漂泊无根、居住过许多国家并在中年和晚年在数所著名大学执教和做研究，使他不会属于任何一个单一的文化传统、学术流派，甚至不属于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而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的知识分子（见本书中译本第 3 页，下同）。（4）由于赫希曼真正开始学术著述是在“二战”后移居到美国之后，与上述大多数当代思想界的巨擘相比，赫希曼的理论著述更晚一些，因而，尽管他在世界经济学界和社会科学界影响甚大，是西方国家“学术界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物”（第 12 页），但相对较少地为学术圈外的普通人尤其是中国读者所知。

一、赫希曼早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和思想探索

从个人生活经历来看，作为一个“全球知识分子”的赫希曼有着传奇、

神秘也无疑是辉煌的人生。阿尔伯特·赫希曼于1915年4月7日生于德国柏林的一个犹太人的家庭。少年时期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社会动荡、政权更替，大致是在进行了长达14年的大众民主实验的魏玛共和国时期长大的。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阿尔伯特在柏林的语法中学学习，且比较早熟。早在14岁的小小年纪里，赫希曼就开始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经济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并在16岁左右的青少年时期了啃读了黑格尔艰涩难懂的《精神现象学》，还从中引申出了“一种人类理性出现的‘道德秩序’”。在这一时期，他还喜欢上了经济学，并注意到了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v）关于市场经济商业周期的“长波理论”（Kondratiev long cycles）。作为一个善于思考的热血青年，赫希曼曾参加了当时德国的左翼社会主义运动，并“狼吞虎咽地”阅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四月提纲》和关于社会主义斗争策略的通讯等等，从而“一生都痴迷于探究变革究竟是如何发生的”（第88页）。在希特勒纳粹政党取得德国的政权后，赫希曼因担心种族和政治迫害，在他的18岁的生日之前流亡到了巴黎，开始了他作为“无国籍人士”的流亡和学习生涯。

到了法国，年轻的赫希曼进了巴黎高等商业研究学院继续学习经济学，并在1935年拿到了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年研究奖学金，去这世界的经济学重镇学习。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期间，赫希曼有机会听了当时声名卓著的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和哈耶克的课，并选修了经济思想史和国际经济学的一些课程，开始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转向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多年之后，赫希曼本人还回忆道：“一直等我到了英国之后，我才如梦方醒……只有在那里，我才真正认识清楚究竟什么才是经济学。”（第156页）在一年英国访学期间，赫希曼还有机会去剑桥大学听了凯恩斯的讲演，但并不怎么欣赏当时已经大名鼎鼎的凯恩斯。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已经越来越不信任任何形式的宏大理论了”（第157页）。在英国期间，赫希曼还结识了阿巴·勒纳（Abba Lerner，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大论战”的一个主要参与者），

并与剑桥的另一个著名经济学家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有了较深入的交流，还深受其思想影响。在伦敦经济学院一年的学习生活，对赫希曼来说意义非凡。到1936年6月再回到法国时，他已经是一个有着自己思想的经济学家了（第160页）。

回到法国后，长达数年的时间里，赫希曼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参加了反法西斯的运动，并于1938年6月在意大利的特瑞亚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rieste）取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翌年，“二战”爆发，赫希曼立刻赶回法国，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陆军，抵抗德国入侵。在希特勒的军队占领巴黎和法国政府投降后，赫希曼隐瞒身份，几经曲折而流亡到马赛，参加了当时一个美国人瓦里安·弗莱（Variant Fry）所组织的紧急营救委员会，给一些犹太人和知识分子伪造证明，代办签证，制订出逃路线，安排过境，护送他们逃出德国军队占领的国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的紧急营救委员会就帮助4000多犹太人逃过了纳粹的魔爪，其中包括200多名犹太文化精英，如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诺贝尔生化学家奥托·迈尔霍夫（Otto Fritz Meyerhof）、画家夏加尔（Marc Chagall）、杜尚（Marcel Duchamp）以及作家安德烈·布勒东（Andre Breton），等等。

这个紧急营救委员会很快就成为纳粹德国和法国傀儡政府（法语：Régime de Vichy）的眼中钉。1940年12月，因担心纳粹的搜捕，赫希曼不得不离开马赛，徒步翻越比利牛斯山，经由西班牙、葡萄牙，于次年元月14日逃至美国，在25岁的时候开始了在美国的生活，再一次成为“无国籍人士”。到美国后，赫希曼很快拿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份奖学金，开始了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习生活，并很快结识了一个来自立陶宛和巴黎的富裕犹太商人家庭的少女莎拉·夏皮罗（Sarah Chapiro），于1941年6月22日在伯克利市政厅与其举行了婚礼，二人结成了终老夫妻。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期间，赫希曼在美国两本重要学术期刊《经

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和《美国统计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上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尤其是在发表在《美国统计学会杂志》9月号上的关于“有限分布中离差的度量”的文章,赫希曼提出了后来被经济学界常用来测量产业集中度的“赫希曼指数”(这个指数在经济学中又被称为“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简称HHI)。在1945年,赫希曼(Hirschmann,1945)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国家实力与外贸结构》。在这部著作第7章,赫希曼运用统计方法计算了多国社会收入分配的情况,实际上首次使用了目前经济学和媒体中常用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这个概念,即根据劳伦茨曲线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一个指标,因而目前国际学界已经基本公认赫希曼才是收入分配中的“基尼系数”的真正发明者^①。

新婚燕尔,经济学论文和著作的写作与发表,并没阻止作为一个行动者的赫希曼再回欧洲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念头。1943年,赫希曼在旧金山应征入伍,随后到华盛顿加入了美国的情报机构,然后被派回到欧洲参加了进攻意大利的美军,做了一名随军翻译。在意大利期间,赫希曼买到了哈耶克刚刚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在战争的间隙中细读了这部著作,深受哈耶克思想的影响。正如这部传记的作者阿德尔曼所评论的那样:“哈耶克对‘奴役之路’的悲叹对赫希曼的意义在于,他促使赫希曼将更加自觉地把个人自由放在首位,更加彻底地怀疑完美知识”,并加深了他对德国纳粹政权的集体主义灾难性社会实验后果的认识(第297—299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赫希曼从美国军队退伍回到华盛顿,随即为了家庭生计而到处求职。非常幸运的是,受当时已经在经济学界久负盛名的亚

^① 1964年,赫希曼在《美国经济评论》(AER)发表了一页纸的澄清文字,标题是“The Paternity of an Index”(一项指标的父权认证)。根据那篇文章,我们今天可以知道,“基尼系数”并非基尼发明的,也不是赫芬道尔重新发明的,而是赫希曼发明的。

历山大·格申克龙 (Alexander Gerschenkron) 的邀请和举荐，赫希曼在美联储找到了一份工作。之后，他以联邦储备委员会经济学家的身份参与了为欧洲战后复苏的“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 的制定与实施。由于厌倦在美联储的官僚机构工作，在 1952 年，赫希曼应邀去南美的哥伦比亚，担任了该国国家规划委员会的财政顾问，走遍了哥伦比亚各地，开始了他之后几十年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以及为拉丁美国国家经济发展献谋献策的生涯。之后，他自己又在哥伦比亚开设了一家私人咨询公司，变成了一个家庭衣食无忧的企业家，从而应验了赫希曼本人经常重复的一个警句：“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最好的回报往往来自最少的计划。”(第 369 页)

二、“50 年来影响最大的发展经济学家”

1954 年 10 月，赫希曼回到美国，参加了在麻省理工学院召开的一个由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办的讨论热带地区各国经济规划问题的研讨会。在会上，赫希曼结识了当时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如马克斯·密立根 (Max Millikan)、沃尔特·W. 罗斯托 (Walt W. Rostow)、保罗·罗森斯坦-罗丹 (Paul Rosenstein-Rodan)、霍利斯·钱纳里 (Hollis Chenery)、罗伯特·索洛 (Robert Solow)，以及著名的博弈论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 (Thomas C. Schelling) 等等。在为这次会议提供的论文中，赫希曼受哈耶克思想的影响，对经济学家的“理性自负”提出了批评：经济学家无法免俗，同样受困于普遍的“权力欲望”，因此往往不“承认他自己的能力也是有限度的”。由此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是，经济学家们产生了“一种错觉：利用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就可以为不发达国家绘就详尽的发展蓝图”。当然，赫希曼并没有否认经济学家的作用，他只是告诫大家不要过份着迷于理论分析，同时对那种制定“包罗万象的综合发展规划”提出了警告。赫希曼认为，“如果经济学家能够尊重现实，坚持到实地进行细致的观察，并准确理解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实践的意义，而不是盲目依赖于总量统计数字，那么他们可能会做得更好。”(第 405 页)

到了 50 年代中期，幸运女神向还在哥伦比亚开私人咨询公司的经济学家开始微笑了。1956 年的 7 月，赫希曼在哥伦比亚的波哥大收到了耶鲁大学经济系系主任劳埃德·雷诺兹（Lloyd Reynolds）的一封信，邀请他到耶鲁（1956—1957）做一学年的客座研究教授。赫希曼很快接受了这一邀请。在后来 2005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的帮助下，他们很快在当地找到了房子，全家从哥伦比亚的波哥大搬到了美国的诺斯黑文（North Haven），真正开始走上他作为一个伟大知识分子的学术研究道路，使他“从完全不被人注意的外围一跃到了美国主流学术界的心脏地带”（第 410 页）。

到了耶鲁大学后，赫希曼被聘请为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客座教授。基于在哥伦比亚的多年观察和咨询实践，赫希曼在这段时间撰写了他的经典著作《经济发展战略》（*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1958）。在这本发展经济学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中，赫希曼不仅首次将“发展战略”运用于经济学诸领域，还为发展经济学奠定了“不平衡增长”的理论基础。受哈耶克思想的影响，赫希曼在这部著作中对政府计划的发展提出了批评，把经济发展的动力聚焦在“企业家”身上，而不是计划者。这同时也构成了对“专家们”的能力的强力质疑。在《经济发展策略》一书的结尾，赫希曼告诉人们，传统社会（欠发达国家）最稀缺的东西并不是资本，也不是所谓的“中产阶级”，而是企业家精神，“而那也正是争取个人主义的文化基石”（第 434 页）。赫希曼的《经济发展战略》对当时盛行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挑战，立即引起了当时国际经济学界的注意和关注。一些大师级经济学家则纷纷发表评论。老的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和查理·金德尔伯格（Charlie Kindleberger，曾是赫希曼在美联储工作时的同事和好友）在书评中则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而凯恩斯传记的作者、著名经济学家罗伊·哈罗德（Roy Harold）却高度赞扬，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则表示赞同，而当时还年轻的印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虽然对这本书的一些观点提出了一些疑问，但也为这部著作给发展经济学这个“一度被陈词滥调主宰的经济学分支带来了缕缕新风而

表示无比钦佩”。这本《经济发展战略》一问世,就成了发展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从而奠定了赫希曼在国际经济学界中的学术地位。

《经济发展战略》于1958年出版后,赫希曼在耶鲁的客座教职也接近结束了。这时,幸运之神又再次对赫希曼展露了微笑。在他在耶鲁认识的一个反传统的著名政治学家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 Lindblom)的推荐下,赫希曼先到在加利福尼亚的兰德公司找到了一份研究工作。接着,哥伦比亚大学又向他伸出了橄榄枝,邀请他为正式教授,教国际经济学。赫希曼很快接受了哥大的邀请而回到纽约,从而正式进入了美国高校的学术殿堂。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期间,赫希曼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和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成了好友。这一期间,赫希曼继续关注发展经济学,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发展问题,并撰写了他的第三本书《迈向进步之旅》(*Journeys Toward Progress*, 1963)。与他的第二本书一样,这本书一出版,立即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很大轰动,很快就成了一本经典著作。在这部著作中,赫希曼主要探究了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对应的政治发展过程。虽然赫希曼并不希望通过革命来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但是他又强调:“如果改革落入了‘国家安全至上’的框架,那么即使避免了革命,也未必一定是‘不幸中之大幸’。”此外,赫希曼还在书中突出了社会科学家的重要作用(第476页)。《迈向进步之旅》出版后,赫希曼本人获得了一个“改革贩子”(reformmonger)的绰号。赫希曼坚持要通过改革来实现进步的观点,在美国也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好友塞缪尔·亨廷顿警告说,现代化和改革将使第三世界陷入剧烈的动荡;而历史学家和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也曾认为,如果没有根本性的变革,发展就会陷入停滞,以往的成果也将毁于一旦。“随着沃勒斯坦对非洲经济前景的警告变得越来越耸人听闻,赫希曼发现,自己与他的分歧也日益增多了。”(第477页)

《迈向进步之旅》出版后,赫希曼马上寄了一本给了在哈佛大学任教的老

友——也是对他本人有知遇之恩的伯乐——格申克龙教授。格申克龙本人即时也在他个人影响的巅峰期。他立刻在背后运作，努力把赫希曼从哥伦比亚大学挖到哈佛大学经济系来。这对赫希曼来说当然是个最好的选择。当赫希曼做出选择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和校方都竭力挽留，但是为时已晚。他随即离开了哥伦比亚大学，就职于哈佛，被任命为卢修斯·N. 利陶尔（Lucius N. Littauer）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

1967年，赫希曼出版了他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又一本重要著作《发展项目之观察》，该书一出版，又轰动一时，立即被列为“100位哈佛教授所推荐的最有影响的书”之一。之后，一位巴西学者边治（Ana Maria Bianchi）将《经济发展战略》《迈向进步之旅》和《发展项目之观察》称为“赫氏拉美发展三部曲”。之后，这一说法在国际学术界广为流传。在这本“拉美发展三部曲”之三中，赫希曼提出了“项目”可以形塑制度因而往往是“制度促进器”的观点。在第一章，赫希曼还创造了一个术语：“隐蔽之手”（Hiding Hand），用来描摹那种隐藏在“跌跌撞撞地取得了成功”的过程背后难以琢磨的力量。赫希曼提醒读者，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即那种神秘莫测、总是躲在幕后的市场力量的作用不同，他所说的“隐蔽之手”，强调人们在从事社会经济行为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时，即有一只“手”遮蔽了各种实践过程的困难，导致无法事前看到非预期结果，这样反而促使人们勇于迈开探索实践的步伐，激励人们付诸行动，去做一些“如果早知道就肯定不会去做”的事情。

赫希曼的《经济发展战略》《迈向进步之旅》和《发展项目之观察》这发展经济学的三部曲出版之后，在国际经济学界和其他社会科学界乃至普通读者中都引起了轰动，产生了巨大反响，以至于美洲开发银行战略规划部首席经济学家弗兰西斯科·梅西亚（Francisco Mejía）曾认为“赫希曼是近50年来影响最大的发展经济学家”。然而，他的一些政策建议却没有在现实中得到接受和实施，他的发展理论也曾遭到一些老派发展经济学家的冷漠对待和批评。

因此，在 1968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赫希曼（Hirschman, 1968）感叹说：“阻碍人们形成正确变革观念的那些东西变成了变革自身的重要阻碍”。^①对任何一个处在制度变迁中的社会而言，赫希曼的这句话又是多么地正确和切中时弊啊！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969 年末，刚从拉丁美洲旅行回来的赫希曼写了一篇“在拉丁美洲如何学会放手？为什么要放手”的短文。这篇草稿墨迹未干，赫希曼就把它送给了当时在哈佛大学任教的青年教师萨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②。尽管当时有着左倾思想的鲍尔斯对赫希曼本人很尊敬，但还是判定这篇文章是“一篇力图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宣言”。鲍尔斯认为，主张在拉丁美洲“放手”，或者说听任拉丁美洲自行发展，“就意味着把这些国家留给民族资产阶级，使他们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第 521 页）。

自 1966 年加入哈佛大学，到 1972 年离开去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做访问研究，赫希曼在哈佛大学经济系实际执教了大约只有 6 年。其间，它不但与一些在当代经济思想史上的大师级经济学家做了同事和朋友，其中包括名满全球的经济学家如亚历山大·格申克隆、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以及哈维·莱本斯坦（Harvey Leibenstein）等——这些经济学家后来很多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和一些正在迅速成长的年轻经济学家如迈克尔·罗斯柴尔

① 在这篇文章中，赫希曼还指出，拉丁美洲人并不是（旧）范式和观念的唯一囚徒。支配着北美（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和决策者的思维也好不到哪里去（第 514 页）。这种评论自然会引来一些经济学同行们的不快乃至愤懑，故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总是对赫希曼“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或许也是尽管赫希曼一生有很多重要的理论发现（包括创生了“基尼系数”这个概念），但却无缘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原因。

② 鲍尔斯早年是一个在美国偏左的经济学家，现为美国桑塔费学派（Santa Fe Institute）的领军人物之一，在制度的演化理论中有诸多重要的理论贡献。鲍尔斯早年曾在哈佛大学经济系任职，曾在在职期间状告哈佛大学，虽然他赢得了官司，但后来被哈佛大学解聘。2008 年，我们曾邀请鲍尔斯教授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讲学，他是笔者所熟悉的一个学术朋友。

德 (Michael Rothschild)、赫伯特·金蒂斯 (Herbert Gintis) 以及塞缪尔·鲍尔斯做了同事和朋友。这段时间,赫希曼也从他的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逐渐拓宽到更广泛的社会科学领域。1970年,赫希曼出版了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这部著作篇幅不大,但新意迭出,洞见满篇,字字珠玑。赫希曼在这本书中博采众家之长,将许多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的研究和思考综合起来,并将社会观察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熔为一炉,提出了企业、组织和国家中一个问题:由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类的生产活动会创造出一定的剩余,从而使各类组织都程度不同地具备了承载低效运行的能力,因而,绩效衰减迟早会发生。赫希曼发现,面对组织绩效的衰减,人们有两种选择:一是退出,二是呼吁。赫希曼论述了这两种恢复机制的运作机理和方式,各自的优缺点,理想的运作次序及组合,二者间的交互作用及适用条件,以及忠诚对退出与呼吁的影响。这些观点看来似乎都是对现实观察而悟出来的大实话,之前好像还没有思想家做这样的理论化阐述。故这部著作一出版,有关评论就如潮水般涌出,“而且几乎所有的评论都是完全不吝溢美之词的好评”。就连这本书出版时的审稿人,当时已经是名满学界的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 (Kenneth Boulding) 也对这本书评价很高,称赞这是一本“杰出的著作,而且偶有惊人之论”,因而建议将之立即出版。于是,这本书很快就被国际学界公认为当代社会科学发展历史上的一块里程碑。当然,在国际上也不乏一些大师级的学者对这本书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如当代社会选择理论的巨匠戈登·塔洛克 (Gordon Tullock) 就对这本书不屑一顾,坚持认为呼吁与组织的衰退没有任何关系,一切只与垄断有关。而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曼瑟尔·奥尔森 (Mancur Lloyd Olson, Jr.) 实际上对这本书评价也不高。就连当代一位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布莱恩·巴里 (Brian Barry) 也对这本书颇有微辞,说其论述的虽然是“简单的”本质性问题,但却像摇滚巨星的唱片一样,一发行就影响力巨大,使这本书出版本身就成了一个重大事件。

在《退出、呼吁和忠诚》一书出版不久，赫希曼在哈佛又撰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学术论文：《政治经济学与可能主义》。在这篇重要论文中，赫希曼提出了他的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我们不可能具备完备的知识，我们必须欢迎不确定性。”他坚持认为，“历史不但是不可预知的，而且如果历史不是不可预知的，那么就不可能发生任何变化。”（第 568 页）这显然与哈耶克（Hayek, 1937）在 1937 年发表的在伦敦经济学院学报《经济学人》上的《经济学与知识》以及 1945 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知识在社会中运用》（Hayek, 1945）两篇经典文献中的观点完全精神相通。然而，赫希曼却发现，在当代社会中，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家都越来越痴迷于预测的准确性和完美性，因而他认为这种倾向太糟糕了：“我们总是试图去预测变化”；“天下熙熙，皆为确定性而来；天下攘攘，皆为预测确定性而往”。据此，赫希曼用法国作家福楼拜一句格言来警告当代社会科学家：切勿“急于做出宏大结论”（*la rage de vouloir conclure*），因为那只会把我们带入一个由“伪洞见”“唯一结果”和“唯一路径”所组成的世界。由此，赫希曼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当时流行的社会科学研究基本出发点的主张：应彻底拒斥时下最流行的那种以“确定成功或失败的‘先决条件’为目标的‘研究方法’，转而将注意力集中到可能的路径、奇特的事物、异常的现象以及突发的和意外的后果上来”（第 569 页）。社会科学研究的出发点不同，理论基本假设不同，也会带来不同的实践导向。赫希曼认为：“社会科学家总是在寻找最优政策和最佳状态，这通常也就意味着他们在寻找构成这些状态的理想但却相互对立的成分的最优组合。与之不同，我们要寻找的则是正确的组合，不仅仅包括接触型政策与非接触型政策的组合，还包括中央控制与分散行动的组合、精神与物质奖励的组合、技术进步与社会正义的组合，等等。”之后，赫希曼还补充道：“我之所以会与激进主义分道扬镳，是因为我认为，人类行为所非意图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这是哈耶克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的著述中所常用的一个术语——笔者注）是非常强大的，也是‘统治阶级’绝对所无法控制的。‘统治阶级’即

使能启动某些事件，这些事件也可能引导整个国家进入‘统治阶级’所从来不想涉足的某个领域。”（第 570 页）今天看来，单凭赫希曼的这些洞见本身，难道就不值得获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

《退出、呼吁和忠诚》的出版，标志着赫希曼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走向一个更宽广的跨学科的经济社会思想研究。在与哈佛大学的年轻的同事赫伯特·金蒂斯、鲍尔斯等人的交流中，赫希曼把人们对来自他人奖赏的快乐与人们对他们自己的快乐的偏好“按字典顺序进行了排列”（Lexicographic ordering），创作了他最有影响力的论文之一：《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收入不平等的容忍度》（Hirschman, 1973）。在这篇论文中，赫希曼提出了经济学中的一个隐喻效应“隧道效应”（the tunnel effect）。对于这个隧道效应的发现过程，本书是这样记述的：

赫希曼用它来刻画人们的情绪从满足变为愤慨的动态过程，并用它来揭示决定了这种情绪变化的预期变化的奥秘。有一天，赫希曼在波士顿洛根机场隧道入口处陷入了一场交通大堵塞，他耐心地观察了其他司机的情绪变化，也细心地品味了自己的情感变化。当拥堵开始缓解时，赫希曼注意到，那些被堵在纹丝不动的车道上的司机在看到相邻车道上的车子开始移动时，心情显然变得舒畅了一些，因为他们预期到，既然别的车道已经疏通了，那么他们自己所在这个车道应该也很快就会变得畅通。然而，这些司机在等待了一段时间后，就开始不耐烦地按起了喇叭，他们开始羡慕别的车道的司机了；很快地，他们的心情从轻松变得成了嫉妒，而嫉妒又转变成了愤怒，因为这些司机开始觉得有人在欺骗他们。这样一来，他们的心情也就变得比原来还要糟糕很多——他们曾经觉得受到了帮助，因此大感欣慰，现在又觉得被剥夺了，因此非常愤怒。（第 587—588 页）。

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当代人类学大师，也是赫

希曼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的同事和好友克利福德·格尔茨高度赞扬道：“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无比奇妙生动的比喻，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一千个复杂的图表。这篇论文也印证了我长期以来一直怀疑的一件事情：小汽车是社会心理学家的移动实验室。在自己的小汽车里，人的本性会赤裸裸地显露出来。”远在英国剑桥的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数年之后读过这篇文章后，也深为激动，立即写信给赫希曼，称赞他这篇文章是“最微妙的讽刺写作方法的典范之作”（第 589 页）。

除了这一活泼生动比喻的“隧道效应”外，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到拉丁美洲的访问中，赫希曼在巴西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特别迷人的悖论。“经济的快速增长为政府提供了某种合法性，或者说，有人相信经济增长能够为政府提供合法性。到 1974 年的时候，隧道效应实际上已经耗尽，这可能是因为，在政治方面一直没有什么进步。然而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却是，人们并不相信经济扩张的真实性。”（第 600 页）在巴西的这次访问中，赫希曼还发现，在拉美当时的发展阶段，政府养成了一个“自我毁灭”的习惯，即竟然相信了自己真的能够不断促进经济增长的神话。“高经济增长率造成了一种过强的白噪声，完全淹没了源于其他社会问题的其他‘噪音’，从而有效地隔离了决策者。”这个发现促使赫希曼写下这样一个标题——“对隧道效应的修订”：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决策者有可能相信，形势一片大好，一切都尽在掌握之中。在这种心态的主导下，对“伟大成就”的宣传，以及对高增长率能否维持的忧虑，就会淹没那些来自“忘恩负义的群众”（这是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抱怨）的、与“主旋律”不一致的声音。同时，由于社会辩论（如果存在社会辩论的话）的焦点也完全集中在经济问题上，这可能会误导政府，使政府以为主要问题仍然是经济，尽管人们真正想要的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会成为自己压制表达自由的政策的受害者。（第 610 页）